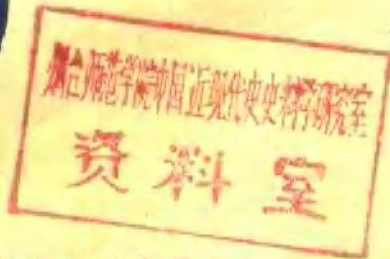


# 廣州文史資料

(选 辑)

第 二 十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t/00/15

# 广州文史资料

(选 辑)

第 二 十 二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 9 8 1 年 4 月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981年4月 印数1—6,000

书号：11111·74 定价：0.81元

# 目 录

- 重洋风雨忆当年.....庄敬民 ( 1 )
- 刘少奇同志在广州 .....何锦洲 ( 17 )
- 先施公司群众运动的片断 .....肖汛波 ( 31 )
- 忆东征粤中 .....陈 军 ( 42 )
- 邓龙光所倚重的团长黄道遵被俘经过  
.....谢 创 ( 66 )
- 我国军队代表制的历史演变  
.....陈以沛、邹志红 ( 72 )
- 闽西省委建立初期情况与“整肃社会民主党”  
事件记述.....余仲琪 ( 93 )
- 三多轩的今昔.....荔湾区政协写作组 ( 101 )
- 美商德士古公司简述  
..... 郑炳华 口述 邱庆鏞笔录 ( 108 )
- 广州私营土什木经营管理的一些见闻  
.....黄曦晖 ( 131 )
- 广州饼干业简史.....陈国康 梁 文 ( 168 )
- 记广州河南精武体育会 .....鲁 生 ( 187 )

广州各公益社团概况 .....李汇川 (195)

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成立经过

.....**雷卓峰** 戴俊英整理 (211)

抗战初期蒋桂争夺青年见闻 .....张 洁 (223)

陈济棠在赣粤湘堵截红军长征的概况

.....侯梅 李友庄 (232)

## 附 录

关于石达开原籍广东增城县人的历史资料

.....增城县志编委会 (240)

# 重洋风雨忆当年

庄敬民

一九二四年，我十七岁，跟舅父到了荷兰当海员工人。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帝国主义者惨杀上海工人顾正红，当时欧洲海员工人群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上街游行示威，并募款寄回祖国。同年六月份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凡从欧洲到香港的船舶和海员统统返回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我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份，大革命失败后，绝大部份海员工人重返欧洲当海员工人。我到了比利时亨锅港，即与当地赤色海员工会联系，认识了海员工会书记Falansmolo（花兰士妙罗）同志，并加入赤色海员工会。我在比利时常和他一起到有中国海员的船上联系，并诱导中国海员到工会去走动。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我到荷兰律打泵，我叔父叫我下船继续当海员。我打算到美国找工作，俟机进行革命活动。船航行到美国港口罗生基离，靠码头，当晚十一时，我即设法

避开手持武器的守卫，潜逃上岸。守卫发现我爬闸门逃走时，即对我发射几枪，没有打中。我上街后，雇了一辆小汽车，走了几个小时，天亮才到罗生基离，有一个同乡海员张祥仔将我收留下来，住了几天。他出路费帮我买火车票，从罗生基离经过芝加哥到纽约，找到我的堂叔庄步云，经他介绍我到餐馆当工人。每月工资九十元。

当时纽约有个中国留美海员的地方团体，其组织成员是东莞和宝安两县的海员工人，名称为“东安公所”（听说现在改名为“东宝公所”）。凡是在纽约的东莞、宝安两县海员工人都自然是该公所的成员。因我是宝安人经常在该公所出入，很快就和海员工人熟识，并且肯为大家服务，如代写信、汇款回祖国等工作，获得大家信任和好评，在公所改选时，我即被选为该公所领导成员之一。这些领导成员有：洪和兴、庄步云、蔡滋田、陈发仔、和我五人。

我在“东安公所”认识了一个海员罗维良。他见我有时谈及省港大罢工的情况，就向我宣传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要我加入美共东方部所组织的“反帝大同盟。”我就于一九二八年底由他介绍加入这个组织，并接受任务，在东安公所做海员工人运动工作；并为“反帝大同盟”所组织的《中国先锋报》做些具体工作，如晚上到出版部义务当排印工人，排好版后交美共《工人日报》印刷出版。

当时“反帝大同盟”内有个留学生叫程科美（是广西人）。他和我两人经常到唐人街组织中国海员工人参加美共

组织的群众“露天大会。”当时美共第二把手Forster同志每次都在群众露天大会上讲演。

一九三〇年，美国经济危机。美总统胡佛提出“排斥外国侨民方案”，即将侨居美国而没有居留证的外国工人驱逐出境，作为解救美国工人的失业问题和经济危机的措施。侨居美国的中国海员工人，百分之百没有合法的居留证件。我和罗维良两人奉“反帝大同盟”使命，组织中国海员工人到中华会馆开会讨论，其目的是要求中华会馆主席以中华会馆名誉草拟电报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华会馆主席不接纳我们的要求，并打电话给纽约的中国领事馆，领事崇雄志接电话后，马上亲到中华会馆企图说服我们。我们和他争论得很厉害。结果领事和中华会馆主席还是拒绝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这一目的没有达到。

第三天，国民党大右派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美国留学生，他任汪精卫在纽约办的《民气日报》的主笔）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民气日报》上），骂我“庄敬民是美国共产党的走狗。”从此我的政治面貌就被公开了。我们在“反帝大同盟”所办的《中国先锋报》上刊登一篇文章，揭露陈春圃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那时我没有想到会脱产去搞革命工作以终一生。

一九三〇年，我在美国纽约的政治面目公开了。政治活动有困难。“反帝大同盟”有些同志，如何植芬、莫震旦、李道宜（他们是留美学生）等人向我建议，要我到欧洲去搞



海员工人运动。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下船工作。船到比利时上岸，在亨锅港我又到海员工会去，找到了海员工会书记花兰士妙罗同志一起开展中国海员工人运动。一起到船上向中国海员作宣传鼓动，并组织他们到海员工会里面饮咖啡、啤酒（楼上是海员工会，楼下是一间酒吧）娱乐。

一九三一年三月间，我从海员工会里接到从德国柏林以廖承志的名义寄给我的一封挂号信，并附有五个英镑。信中说：“你马上到荷兰律打泵去与海员工会取得联系，并找到梁思齐同志作你的助手，把荷兰的海员工人运动搞起来。”我到律打泵后，首先组织海员工人反对包工头吴日铭克扣剥削的包工制度。有些工人因而与吴日铭的走狗打起来，有的声言要打死吴日铭和他的走狗。我劝工人不要使用暴力，阐明目前我们要组织工人，团结工人，到时机成熟时发动工人大罢工。这便是：“团结就是力量、斗争就是我们的出路”。工人们就放弃了持枪暗杀吴日铭的计划。这时组织上每月给我二十元美金生活费，从此我就脱产闹革命。

一九三一年七月，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地点在德国柏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欧洲各国海员工人代表会议。我代表中国海员工人出席。会议由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书记Walter同志主持，会期五天，主要内容是：反对欧洲各国航业资本家降低海员、码头运输工人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到时机成熟时，即发动海员、码头运输工人罢工，同时提出的口号是：“不分民族色种同样工作、同工同酬。”

我从阿姆斯特丹乘火车回到律打泵，是晚八时在海员工会组织有关人员传达会议内容。岂料散会后我走到对面街角时，两个暗探，用手枪迫住我说：“看看你的护照！”我即在衣袋里掏出护照，他们看完即说：“我们找了好几个月，现在才找到你。”两人抓住我的衣领，用手枪对着我背后，就这样我被捕了。到警局后，他们对我全身搜查，衣袋里的信件，主要是廖承志给我的信，还有荷属东印度留学生（他们给我联系的地址卡片）、平时给我联系谈工作的卡片，都被他们抢去了。在警察局拘留半个月后，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把我投入牢狱中去。

拘留在警察局半个月的时间里，遇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一天忽然有个荷兰人拿一封信对我说：“我是律师，有一位荷共负责人是你的朋友，他写了这封信，要我带来转交给你，要你把你事实写给我，即能帮助你获得自由。”我拆开信一看，内容和来人说的一样。我知是计，即严肃地回回答说：“荷兰人没有一个是我的朋友，你是冒充律师。我是中国海员工人，从一九二四年就在荷兰船上工作，我在荷兰没有犯罪，我反对航业资本家对工人克扣剥削，是合法行动；你们拘捕我是非法的，我没有什么要写给你们，也用不着你们帮助。”此人又问：“你在荷兰，什么人是你的朋友？”我回答说：“所有在荷兰的中国海员工人都是我的朋友。”我说完后，即不理他，转身就退走。第二件是几天后，警察局的看守人拿一封邮寄的信给我，说：“这信是海

员工会给你寄来的，你看信后，可给工会回信，我替你转送。”我接信后未拆，看了信封一下，即对看守人说：“我没有荷兰朋友，请你将原信退回去。”事实很明显，敌人一再用手法，企图诱骗我承认与荷兰同志有关系，他们就可将荷兰同志逮捕。我已意识到这点，所以，不上敌人的当。

我七月间被捕，在警察局拘留半个月。至七月下旬不经任何合法手续，将我投入监狱，到九月中旬决定将我驱逐出境，并要引渡回国移交南京政府。为什么要引渡？我想其原因是：因为我被捕时来不及烧毁衣袋里廖承志同志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谈到南京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等，这便是敌人引渡我移交南京政府的主要根据。这一定是与南京政府驻荷兰大使馆研究决定的。

事后我了解到，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被捕后，欧洲各国海员工会的工人纷纷打电报给荷兰政府，要求无条件释放我。这是维也纳海员工会书记后来对我说的；一些杂志也刊登这些消息。

敌人决定把我引渡的消息传出后，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向各地港口发出电报，要他们设法将我营救。引渡我的船舶是一艘客货轮，路线是从荷兰律打泵港经比利时亨锅港、意大利占那华港、过苏伊士运河到上海港。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发电报给沿途各港口海员工会，要求组织在轮船到码头时营救我。

九月下旬，荷兰政府武装人员随船押送我到比利时亨锅港，船到港靠上码头，武装人员将我扣上手铐，移交当地警察押送我到监狱（是监牢不是拘留所）。在狱的第三天，看守人员打开牢门对我说：“外边有你两位朋友来看你。”并把我引到外边接见室。原来是比利时海员工会书记花兰士妙罗和另一个我未见过面的比利时同志，我见到他们时满心喜悦，和他们握手后，便问他们怎样会知道我在牢中？他们说：“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打电报告诉我们，故船到港时，我们即上船向船长要求将你交给我们。船长对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即将电报作证：‘庄某就是在这艘船上’，船长无话可辩，才如实告诉我们，已将你暂押到监牢里，待装完货开航再押送回船”。我听完后即说：“你们不应该把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的电报作证明给船长看，暴露我和你们与第三职工国际的关系是不对的。而且不要因我而牵连你们。你们这样做，我于心不安，请考虑我这个意见。”花兰士妙罗说：“这是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的意见，我们不得不执行。”我又问：“将用什么方法营救我呢”？他们说：“到船上鼓动和组织工人罢工，使船不能开航。”我对二位同志说：“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因船上三种不同民族的工人：一是中国工人；二是荷兰工人；三是荷属东印度人。就算船上全体工人都同意罢工也不行，只要船长打个电话或电报给航业资本家，几个小时就有另一批工人来比利时亨锅港，还是可以开航。我想你们不要因为

营救我而牵累你们吧！这个意见希认真考虑，也请将这个意见向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汇报请示。”

我不同意花兰士妙罗的计划，但我到底是怎样脱险的呢？

船从比利时亨锅港开航，到占那华港靠码头后，岸上警察同样将我套上手铐，押送到监牢里。三天后又把我押送回船交给船长。在船上，白天让我自由活动，晚饭后即关起来，将门锁上。

我怕船到上海后，会无辜牵连到船上的一些中国海员，所以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接近我。

船离开占那华港，在行进中，有一个荷兰青年工人，是厨房的练习生，年约二十岁左右，偷偷地接近我，问：“你有什么方法脱险？你要不要钱？要多少，我可以给你一些带在身上备用。”我对他说：“我有办法脱险，等船过苏伊士运河时，我跳下河去就可以了。”他说：“这个办法不行，我知道船长有防备，到苏伊士时，将你关在房子里，还要派岸上警察到船上看守你。因此，到时，你不可能跳水。不如明天船到意大利墨西拿河，我们给你准备一个救生圈，你从船尾跳下去，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脱险。”我很感激，随即很简单地给廖承志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我准备死中求生，跳海脱险，如果死了，我对革命工作已尽了职责，如还活着，当仍做革命工作，但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她守寡一生，只有我一个独子。假如我真的牺牲了，中国革命成功

时，如你活着，希你告诉组织，照顾一下我老母亲，我在天之灵就安慰了。”我写完此信即交那个青年工人请他代我邮寄。

第二天上午10时，船驶进墨西拿河，他叫我跳下去，我说：“不行，因为旅客站在船两旁看山景，他们会发觉的，等到十一时半他们都到餐厅吃午饭时，我才跳下去。”他告诉我：“到时船已越过墨西拿河到达地中海海口，那里波涛、暗涌很大，很危险，你无法游到西西里岛去，”我说：“我不怕，你们准备好救生圈给我就行了，”我按此计划跳下水去，在水中抬头往驾驶台望去，驾驶员眼睛向船头看，见不到我，直到船去远了，我才用力向西西里岛游去。因波涛暗涌很大，一个接一个从头上盖过来，很难前进一步。从中午十一时半到下午三时半，足足游了四个小时，已毫无气力，恰好有一条意大利客船经过地中海，发现我浮在海上立即停航，放下两只救生艇，将我救起，到船上由医生抢救。这时我全身筋骨痛的要命。

当晚九时，船长和大副都到医生房来看我，问我为什么要跳海，我说：“我在机舱值班因受不了压迫，和荷兰人轮机员打架，将他打伤了，就跳海，”我问他们这艘客船是哪个国家的？他们说：“是意大利拿波里港的，明天船抵该港码头后，我将你交给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转交给你们中国领事馆。”

第二天船到拿波里港，船长果然将我送到地方政府，地

方政府又将我转交给中国领事馆。这个领事原籍是意大利人，满清时代，他父亲是意大利政府派驻中国的大使。因此，满清政府就委派他的儿子驻拿波里领事馆代中国领事，中华民国后，政府仍委派他继任中国领事。当时领事问我为什么要跳海，我的回答同上面说的一样。当时中国留学生符罗飞在场，领事叫符带我到旅馆安置住宿。在旅馆我对符说：“要寄封信给我在德国的朋友，请你把领事馆的地址给我写下，叫我的朋友寄些钱来应用。”他写下地址，我马上给廖承志写信，说明我已经脱险，需要点钱往别的地方去。

我希望尽快离开此地，即到码头看一下是否有中国船舶停泊装卸，以期设法留在船上不下地，可是码头只有一艘日本船，我也想利用此船溜走，即行上去，在舷梯向上走时，即被盘问阻止。旋即返回中国领事馆，对领事说拟乘日船离去，领事急忙说：“你千万不要坐日本船走，“九、一八”事变，他们已经侵占东北三省，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说话时，符罗飞同志也在场，这时领事馆接到电话，听完后对我说：“现在当地政府给我来电话，说运载你的那条船给当地政府打来个电报，说你在荷兰是个政治犯，在引渡航行中跳海的，现在当地政府说不能给你自由行动，将你拘留，等待驱逐出境，你在此等一下，当地政府马上派人来，你不要怕，我是同情你的，你要出境到那里去，告诉我，我将帮助你获得自由不返中国。”我说：“我要到德国汉堡当船员去。”不久，当地政府警察来到领事馆，领事将

我交给他们，带我到警察局拘留所一天，然后将我送到监狱中去（没有问过话）。

我在监牢里住了一星期后，领事叫符罗飞同志看我，并对我说：“你德国的朋友来电，把钱汇到领事馆，是意币八百个里拉，我代你收下，待你出境时，将此款交给你。”到了第三个星期，领事叫符罗飞代他写了一封信，由他带到牢里给我，信内说：“你德国的朋友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质问我，你现在何处？我回信给你的朋友，说你现在仍在牢狱。”又等了几天，领事和符罗飞同志一起亲自到牢里看我，并对我说：“现在我已和你办好出境手续和护照，你可以出境到奥地利维也纳去，那里是自由城市，不受约束和限制。现在已是十一月下旬，天气很冷，我请符罗飞替你量一下身体尺寸，请他给你买件大衣，余下的里拉数目再告诉你，到奥地利边境时，解你出境的人会将此款交给你，一丝一毫不能少，如果少了，你到维也纳可写信给我，我给你追回。”我抵奥地利边境过境时，警察即将款项如数交给我，没有短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抵达奥地利第一个火车站，当晚买火车票往维也纳，第二天早上到达，即找旅馆住下，立即打电报给廖承志同志，请他汇些钱并指示往何方去。等到第三天上午，忽然有个维也纳的同志到旅馆找我，问我是不是庄敬民？我说“是”。他说：“请你拿护照给我看一下”。我在衣袋掏出护照给他看了。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维也纳



海员工会书记（他的姓名我已忘记），今天早上我接到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书记Walter同志来电报说：“你住在此旅馆”。他拿电报给我看，同时交给我一封信，信中说：“我已打电报给维也纳海员工会书记前往旅店找你，你和他见面后，他会安排你食宿，由当地组织接济你用钱，现在我们不再寄钱给你，你可在维也纳等待去向，到时我们即告诉当地组织转告你便妥”。我在维也纳等了五个星期。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当地组织告诉我：“现在欧洲支部要我安排你前往德国柏林，你到达后找欧洲支部书记Walter同志接头便妥”。我到柏林后，按地址找到Walter同志（我们在阿斯特丹开会时即认识），略谈后，他即叫另一位德国同志引我到楼下找当时留学德国的闵廉（即现在的闵一帆）同志，安排我食宿。在柏林等了三天，就办好了我到苏联莫斯科去的护照。第四天我们五、六位同志一同前往莫斯科，其他几位外国同志的文件也交我随身带上，交给莫斯科组织。我到了莫斯科的当天晚上，陈郁和廖承志同志即找到我，他们二人请我到国际饭店吃了宵夜饭，并送我回宿舍。我到莫斯科五天后，廖承志即离开莫斯科返回祖国。（陈郁同志在一九四〇年在延安和我见面时曾告诉我，我与他在莫斯科握别后，王明即将他送到工厂里当工人，直到一九四〇年和周恩来同志见面后，第三共产国际给他作了结论，说他是中共的好党员，并和周恩来同志一同回国返回延安）。

在莫斯科，组织上安排我和肖三同志，苏兆征爱人苏